

《红楼梦》版本争胜问题的理性思考

■袁世硕

当下《红楼梦》研究中又生出了版本争胜问题。二百多年来，社会上流行的是“程高本”。1982年，北京红楼梦研究所推出了“新校本”，研究者没有特别注意，此后出的几部中国文学史中，都没有讲这个“新校本”，介绍《红楼梦》版本只说有“程高本”和“脂评本”两个系统。红研所“新校本”陆续大量地出版，台湾地区也改出“新校本”，日本也译出了“新校本”的日文本，形成了取代“程高本”的优势。这便引起了部分读者对“程高本”被边缘化的惋惜。“新校本”一方出来力挺其胜于“程高本”的优越性，为“程高本”惋惜的一方便力说其优越性。于是如何对待这两个版本的问题转移到了“程高本”与“脂评本”孰优孰劣的问题。其实两者的表述都不全面，“新校本”一方强调以“脂评本”为底本，而“新校本”却是包含了“程高本”的后四十回；力挺“程高本”的一方将“程高本”的边缘化归咎于读者只知道“脂评本”，而实际上此前“脂评本”只是出了几种供研究使用的影印本，一般读者也都没有去读“脂评本”的白文本。这便使问题简单化了，实则是复杂化了，又不无推向解决这些问题的客观效果。

“新校本”和“程高本”都是一百二十回，叙述的是一个富贵家族的败落和几个主要人物的悲剧结局，小说的整体肌理没有变异，倾向性也是一致的，这也就是“新校本”出来以后，红学研究者并没有特别地重视的原因，解析评论小说的主旨和人物的论著与此前见解基本是一致的，戏曲影视的改编也是这样的。力挺“程高本”和力挺“新校本”的争议只是在前八十回小说叙事的修辞学层面上，几乎都没有涉及到小说的主旨和人物形象的性格。比较的优劣大都无关大体，又难免失于主观判断，而且小说修辞学方面的几点优劣也不能成为判定是否为曹雪芹原著的标准。

双方都强调《红楼梦》百二十回本作者曹雪芹的原创性，便将原来

研究者已取得的一些基本认识作出更难为读者一致认同的论断。力挺“程高本”的一方认同程伟元、高鹗在序言表述的程伟元收集了多种抄本而加以连缀修补成书的情况，但又以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不可能有两位作者作成的理由，认为后四十回基本上是作者曹雪芹作成的，进一步地削弱了高鹗重订的功劳。“新校本”一方进一步地推断曹雪芹是完成了《红楼梦》的创作，也淡化了高鹗重订修补的事实，所以在一次出版的作者署名中，匪夷所思地添加了一位“无名氏”排挤了高鹗。这样一来，高鹗就成了牺牲品。按照现有的文献都表明高鹗对《红楼梦》后四十回是做了重订的，当代研究者也大都对不相信张问陶所说的“续书”之说。其实高鹗自己就有过表述，他有一首题目叫做《重订红楼梦小说既竣题》的诗，诗云“老去风情减昔年，百花从里日高眠。昨宵偶抱嫦娥月，悟得光明自在禅。”明白地表明他是重订了《红楼梦》小说的。“百花从里日高眠”句，意谓他曾多日沉浸在《红楼梦》的小说世界里，诗表现的即是他完成“重订”之时那种自得自赏的心情，自以为明白了《红楼梦》所写的那种人生情状，明白了这部小说的艺术内蕴。

就“程高本”和“新校本”争胜问题而言，从历史主义的态度讲，既然高鹗整理的“程高本”行世为这部小说赢得了经典地位，功不可没，那么现在红研所整理的“新校本”前八十回是以脂评本为底本，与“程高本”有许多异文，也应有行世的资格，可以评说，却没有理由阻止印行传播，何况它较之“程高本”无可置疑地恢复了曹雪芹叙事的原貌。

“新校本”本应做前八十回与“程高本”的校勘，从小说修辞学的角度，进一步证实其为曹雪芹底本，当下为争辩所作的举例说明也没有抓到实处。据我对读两本所知的零星异稿，或有助于补证它是曹雪芹的原稿，而不是出自重订者笔下。一处是第二回“冷子兴演说荣

国府”，冷子兴说到贾宝玉“似傻如狂”的话语，其中“‘女儿’两字是最尊贵的。比那阿弥陀佛、元始天尊这两个宝号还更尊崇无对的呢”，在“程高本”里却用“瑞兽珍禽”“奇花异草”取代了佛道两家最高神祇的名称。“脂评本”的用语显然更符合贾宝玉的性格，用“瑞兽珍禽”“奇花异草”来做喻体，便算不上尊崇“女儿”了。贾宝玉也不是“有时似傻如狂”了。这种对佛道两家最高神祇的大不敬，颠覆了传统的“男尊女卑”观念，只能出自“异端”文人笔下，高鹗是熟读四书五经，正经举业，不久中进士，做了内閣侍读。这类正经文人，需要保持文质彬彬的仪态，用语不会那样放肆。

再有第三十六回，作者叙写薛宝钗等女子劝宝玉结交士大夫、谈仕途经济，贾宝玉说“不料闺房女子也落入国贼禄蠹之流，有负天地钟毓灵秀之德”，“脂评本”下边还有一句：“因此祸延古人，除四书外竟将别的书焚了。”“程高本”删掉了这句话，这句话正如“脂评”所谓的“囹圄不可解之中实可解”之语，意思同《儒林外史》开头陈大宪，借王冕之口批评朝廷“用五经四书八股文取士，读书人既有此一条杀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外都看得轻了”是一样的。高鹗正热衷科举仕进，绝不会公开批评科举和只读“四书五经”的行为。

第七十八回“痴公子杜撰芙蓉诔”，“庚辰本”在诔文前面有一段文字，解释贾宝玉作《芙蓉诔》是师法楚辞的，楚辞是“以言志痛”发愤之作，贾宝玉是不喜读正经书之人，今有此“恣意”，“不为人知，便杜撰此一篇长文”，逻辑上不大顺当，前者之本意，即是贾宝玉作《芙蓉诔》视为楚辞类的“以言志痛”之作。“程高本”删掉了这段文字，也就削弱了这篇诔文的抒情意义，应该是有违曹雪芹的意思。这项校勘工作还是应当继续做下去的，可能还会有更多的发现。

白先勇感慨“程高本”被边缘化，虽言之有据，但所做的辩护却不

能挽回其失落的大趋势，可能只会是无奈何的惋惜。但是他认为年轻人只知道“脂评本”而不知道还有“程高本”之“一梦”，却不是无缘无故的，并非杞人之忧。

“程高本”和“新校本”都是《红楼梦》小说世界的完整形态，“脂评本”即使是基本完整的八十回本，古今读者也都视其为一部未完成的小说。若没有后四十回，那便不是一个完整的《红楼梦》的小说世界，读者看不到诸如“林黛玉焚稿断痴情，薛宝钗出阁成大礼”等情节，那便不会被感动，也不会给予高度的称扬和评价。读者看不到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等几个主要人物的悲剧结局，《红楼梦》也就不成为如王国维说的一部“悲剧中之悲剧”了。文学作品固然要以有馥意余韵为佳，评论家也往往用“余音袅袅”“余韵无穷”“结而不尽”等作为赞誉词，但是一般读者的阅读心理还是期待知道故事有个结果。一部小说无论是长篇短篇，都应该有其完整性，所谓完整性就是表现出一个完整的意思、意义。没有表现出一种意思、意义的事件，便形成不了一个单独存在的整体，具体说即是成为不了一篇、一部小说。比如说当读者只看到八十回的“脂评本”的时候固然有人作文称赞，但他们却没有感觉到《红楼梦》小说世界的悲剧意蕴。我们虽然不能肯定地说没有后四十回《红楼梦》就不可能持久传世，拥有大量的读者，获得极高的文学声誉，而事实上百二十回本的《红楼梦》获得了如此大的影响，赢得了如此高的声誉，这却是无可置疑的事实。“新校本”之所以取代“程高本”而盛传起来，原因亦在于“新校本”沿用了“程高本”的后四十回，所以未完成性的“脂评本”也可以肯定不会盛行于现在和将来。

白先勇认为读者只读“脂评本”会是一种“不健康的现象”，是有道理的。当下确有一种不当地地张扬“脂评本”未完成性的倾向，如果读者只阅读“脂评本”，那将会对《红楼梦》这部文学经典造成很大的伤害。如果看不到《红楼梦》几个主要人物的结局，便意识不到这部小说的悲剧性质、社会内蕴和文学价值。比如说鸳鸯，前八十回只写到了她心地善良、性情和气，是贾母缺少不了的贴身丫头，唯一的一件大事是她抗拒贾赦要收用她的情节，就此读者只能知道她是一个有尊严的女奴。而在后四十回里叙写了鸳鸯在贾母死后自缢的悲惨结局，小说的回目称作“殉主”，显然是旧道德的语言粉饰，若前后对应便显示出其深层意蕴。看到了鸳鸯在贾母死后随即自缢的结局，便能领会到前面鸳鸯拒绝贾赦收房，还是依赖于贾母对她依赖的实用性。她自身并没有抗拒的资格，失去了贾母，也就失去了她的靠山，生命将跌入任人摆布作践的境遇中，自缢就成为她避免更不幸的唯一选择。这一切都由她是一个没有自主权的奴婢身份。再如贾母，在前八十回里读者只看到了她的尊贵、会享乐和在家族内闹的权威，有论者称她是这个贵族之家中最有品格和智慧的贵妇人，宝玉和黛玉的叛逆爱情是在她的溺爱中生成发展起来的，这便是由于没看到后四十回里，她成了制造“薛宝钗出阁成大礼，林黛玉魂归离恨天”这场悲喜剧的幕后推手。小说第三回林黛玉初进荣国府之际，贾母一把抱住失母的外甥女“心肝儿肉叫着，哭了起来。当下地下侍立之人无不掩面涕泣，场面十分动人。待到第九十七回，林黛玉听到宝钗将与宝玉成婚后的秘讯后晕厥，生命奄奄一息之际，贾母在她的床前说：“咱这种人家，别的事儿自然是有的，这心病也是断断不得的。林丫头若不是这心病呢，我凭着花多少钱也使得，若是这个病，不但治不好，我也没心肠了。”冷语刺骨，将黛玉的生命推向了死亡。前后的对应，明显地透露出这位和善的老祖母“以理杀人”的意蕴。这才是《红楼梦》小说世界的贾母形象的典型意义。如果贾母只是

和善、会享乐的贵妇人，那可真成了《红楼梦》悲剧世界的多余人。结构宏伟的《红楼梦》自然不必要一一写出前八十回已出现的人物结局，第五回太虚幻境多位金钗的判词所作的预言，后四十回里都是有所交代的。譬如探春的远嫁和元春之死，都只有简略的书写，但其生命的不幸在前八十回里已经蕴涵在情节中了，而作为全书中心人物，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都是做了浓墨重彩的书写。论释者大都特别关注林黛玉“焚稿断痴情”“魂归离恨天”两回的书写，为之动容，大为称赞书写艺术之高妙。王国维等特别论释后四十回贾宝玉的心路历程，成为“悲剧中之悲剧”之核心。没有贾宝玉的走出，怎么能看到他与他看到了许多人的不幸死亡的那个世界的决裂！其实后四十回对薛宝钗结局的悲剧性的书写也不只是贾宝玉的走出，她成了李纨式的可怜人。她“出阁成大礼”的假戏真唱不就具有了反讽的意味吗？婚后宝钗面对的是一位心里总是怀念着林妹妹的丈夫，宝玉的痴呆和冷漠，长久地处于“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入梦来”（《长恨歌》中语）的期待中。这几回书的书写应该是将第五回判词“金钗雪里埋”的意蕴形象地表现出来，如果只是将宝玉的出家视为宝钗的悲剧，那便将小说所蕴涵的家长制婚姻的悲剧意蕴抛弃了。

版本问题争议的双方虽然各有主张、偏向，争辩的焦点集中在前八十回孰优孰劣的问题上，延伸为何本基本出自曹雪芹的笔下，这个问题其实是不难解决的。可喜的是双方都强调《红楼梦》百二十回的完整性，也是认同这个小说世界的完整性，这便形成了对“脂评本”之不完整性的不认同，殊途同归，形成了对过度张扬“脂评本”不完整性的价值意义的否定。再者，开启对《红楼梦》前八十回两种版本进行比勘、对照的课题，还可能有助于进一步确认曹雪芹原著的叙事特色，增进对曹雪芹其人的认知。

首届“中国小说论坛”在山东威海举办

■刘晓艺

8月下旬的山东威海，暑热褪尽，风光秀丽。8月25日至26日，来自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南开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中国台湾嘉义大学、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美国波莫纳学院、泰国华侨崇圣大学等国内外72所高校及科研机构140余名专家学者莅临这座滨海名城，共襄“2019中国小说论坛”盛事。本次论坛系国内学界首次承办的中国小说综合性学术会议，由山东大学主办、山东大学文学院与文化传播学院承办，为期两天，共收到论文116篇，举办学术报告8场，小组讨论15场。

山东大学文学院院长杜泽逊教授主持论坛开幕式。山东大学副校长刘建亚教授简要介绍了山东大学及其威海校区的发展历史和现状，热情欢迎海内外贵宾拨冗出席；山东大学讲席教授袁世硕在致辞祝贺之余，结合他对《红楼梦》版本争胜问题的研究，提出了对目前中国小说研究的若干思考 and 希望；中国台湾嘉义前副校长徐志平教授对山东大学的邀请表示感谢，希望与会学者从论坛中获得新论点和新认识，并呼吁台湾学者更积极地参与大陆学术活动；山东省作家协会原副主席赵德发回顾了早年在山东大学就读中文系作家团体的经历，代表小说作家群体对本次论坛的召开表示了由衷的支持。

在随后举行的大会发言中，南京师范大学的董志翘教授在《〈太平广记〉校勘》商榷（一）中，就《太平广记》一书在校勘学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了若干商榷性观点。南开大学的宁稼雨教授在《中国叙事学文化学回顾、述评与展望》中，对近三十年的中国叙事学文化学研究进行了全面的回顾与述评。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的李国庆教授在《北美图书馆藏珍稀中国古典小说经眼录》中，梳理了他在编篡《海外中文古籍总目》过程中所发现的一些存于北美图书馆的中国古典小说罕见版本，并对若干中小型北美高校的中文图书馆藏进行了介绍。江

苏社会科学院的萧相恺研究员在《谈稗杂记之关于〈西游记〉〈水浒传〉》中，就二书的版本、作者及若干人物问题进行了澄清与考据。复旦大学的栾梅健教授在《时空观的改述与中国现代小说的叙事模式》中，提出时空距离的消失使现代作家从田园牧歌中走出、转而以文化启蒙者的角度审视故乡的落后和愚昧。华东师范大学的王峰教授在《科幻文学与文学性关系展开了论述。美国波莫纳学院的白亚仁教授在《再谈中国当代小说在美国传播与接受》中，围绕“中国当代小说”“美国”“传播”“接受”这四个关键词展开了报告，揭示了当代中国小说难以被西方读者所真正接受的现象。山东大学的黄万华教授在《海外语境与现代小说叙事语言的成熟》中，从四个时期的文学个案入手，给出了在海外语境中小说叙事语言逐渐成熟的文学史线索。

25日下午至26日下午，论坛以明代以前、明清、现当代等时间段分为3个小组，围绕小说叙事传统、小说语言、中西小说比较、小说文献等子论题展开学术研讨，实现了多个领域的问题意识与创新发现的交融与碰撞。

以论坛的第二组为例。该组重点讨论明清小说，但既取获近当代及域外等的文学理论视角，亦重视中国古典文献学、辑佚学、小说评话的传统，在中西对话、古今对话方面均呈现出有特色的思考。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问题意识。如徐志平教授过去的研究领域一向集中于明清小说，他在《清末民初商界小说的叙事演变——从〈商界变形记〉到〈交易所现形记〉》一文中，以考察“商界”一词以及“商界小说”名称的发生入手，将晚清唯一一部以描写金融业为主要内容的商界小说《商界变形记》与民国初年的《交易所现形记》加以对比，从叙事题材与叙事结构两个面向来观察商界小说在清末

民初的演变情景。徐志平先生提出：“所有的边缘都有其价值”。商界小说就是一种具有现代性的新小说，透过对其叙事演变的考察，能够接榘中国近现代小说发展的轨迹。徐志平先生的问题意识，是建构在翔实的历史文本梳理和扎实的考订功夫之上的，其理论高度的取得，更是基于对中外多种观点和理论的系统汇整。这种有所由来、讲求逻辑的“问题意识”路径值得一众学者借鉴。

二、疆界拓展。如中国人民大学的王燕教授在其与弟子陈艺璇合著的《中国小说西译之嚆矢——梵蒂冈（玉娇梨）手写的发现》一文中指出，梵蒂冈宗座图书馆发现的《玉娇梨》手写本，具有汉字、罗马字注音、意大利译文三种文字合璧的特征，从字迹上看，此版本明显带有摹写刻本字体的痕迹，由此可以判断译者缺乏准确辨认汉字字形的能力；梵藏本所依据的中文底本应为现存版本之外的一个新的早期版本，这就为进一步考察《玉娇梨》的早期版本形态、完善各版本间的衍变谱系提供了新材料。通过一系列理性探析，王燕推测译者方为万济国、石铎球，或为熟悉万济国著作的同时代传教士。这就将中国小说的最早西译时间上推到了1700年左右，打破了此前学界所认知的1730年左右的记录，从而确立了中国小说西译的新的学术起点。

三、钩沉辑佚。如中古古籍出版社的张弦生编辑在《李绿园的逸作及逸闻》一文中，对近年出版的地方志类图书进行了资料汇总和整理，介绍了李绿园逸作《重游风穴寺有怀白马湖》《绿园珍藏药案》《绿园家训》及北冶贞节牌坊对联等。李绿园是古代教育小说《歧路灯》的作者，《歧路灯》则为豫省所产的唯一无可争议的明清长篇小说。昔唐史家刘知几尝谓“郡书者矜其乡贤，美其邦族”（《史通·杂述》）。小说领域的钩沉辑佚，在今日又别有一功，遵循着“矜其乡贤”的旧辙，它能有益于省治与地方的文化传统

建设。

在小说论坛的发言中，有若干重量级的学者对中国小说研究的方向提出了高层次的考察，或对小说的传播史、接受史做出了整体概貌的评述。袁世硕教授在其《〈红楼梦〉版本争胜问题的理性思考》一文中指出，《红楼梦》“程高本”与“新校本”双方将争论焦点集中在前八十回的优劣上，是有局限性的，红学研究者并不应武断地以文采优劣判定作者归属问题。袁教授同样肯定了这场争论对于《红楼梦》的叙事特点、具体认识上起到的积极意义。从《红楼梦》的小说研究个案出发，袁教授进一步提出，分

析作品与社会现实其实是一种双向的理解，正如古人所谓的“知人论世”。白亚仁教授在大会发言中，通过对比亚国亚马逊网和中国豆瓣网这两家读书网站上的读者评论，双向衡量了中国读者对美国小说的接受程度和美国读者对中国小说的接受程度。白教授不无忧虑地指出，中国小说被西方读者所真正接受的道路仍然遥远。他说：介绍到西方是一回事，被西方读者真正接受、喜爱是另一回事，“走出去”相对容易，“走进来”相当困难。这种真实坦率的看法是值得国内学界及翻译界重视的。

目前在我国的小说研究界，既

人文 第一卷 目录	
《人文》缘起	萧振鸣 鲁迅与北京的学苑史迹考（一） 宋 强 老舍《骆驼祥子》的修改
叶嘉莹 为什么讲诗要从《古诗十九首》开始 迎陵学舍	王曾瑜 宋朝专法述论 邓子滨 正当程序的公式与要素
池田知久 近代日本的中国哲学研究	戴潍娜 殉道者，受虐狂与解放过去——读《房思琪的初恋乐园》
陈励武 世界主义，规范的人类共同体与文化宽容	张廷国 探寻黑格尔辩证法的“秘密”——解读马克思的《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
梁 工 《新编剑桥圣经史》翻译与研究札记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周 敏 《天堂广场》：一段纽约往事
对话 张宝明 赵 牧 人文学科：行走在路上——人文学科的困境与选择	学 林 王立新 韦政通和王道的传世情谊
张洁宇 “热风”的温度——鲁迅在一九一九	丁亚平 姜庆丽 论近年来中国电影研究的现状与走向
孟庆澍 “五四”前夕知识界的孔教讨论——以《甲寅》和《新青年》为例	书 评 王金林 提倡中国日本史研究“回归原典”的学术意义——再读刘岳兵《“中国式”日本研究的实像与虚像》
刘增人 五四新潮：一九一九年文学期刊掠影	约稿启事
杜泽逊 《周易正义》文本演变及校勘问题	河南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人文》编辑部编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8月出版。
朱绍侯 王玄漠北伐和北魏南征瓜步是北强南弱的分水岭	
短长篇 刘岳兵 关于日本，他们在《南开思潮》中说了些什么——为总结早期南开日本研究的准备阶段所做的准备	